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 Ltd.
亞太科學出版社
APSP

亚太社会科学
ISSN(O) : 3080-2121
ISSN(P) : 3080-2113
2026 年第 5 期

敦煌佛教文献所见汉藏佛教思想交流与文化互动

张晓琳
（香港珠海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中国香港）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敦煌汉、藏文佛教写卷保留了吐蕃时期到归义军时期汉藏佛教思想交流的直接痕迹。与后世宗派史叙事相比，这批材料可以表现出经典在翻译、抄写、校订、实际使用中所处的中间状态，从而观察佛教思想跨语言传播时发生的选择、误差和重构。本文以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P.T.972、摩诃衍禅宗写卷、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材料为研究对象，从多语文本场、禅宗传播、社会机制、史料方法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认为汉藏佛教思想交流不是经典内容的简单移植，而是通过术语调适、文本再语境化、制度化抄写、社会实践共同完成的；敦煌既是文献保存地，又是新意义生成的文化接触区。由此可见，早期藏传佛教的形成应该放在多源佛教传统持续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来理解，而不能把个别写卷所能证明的事实、传播范围和宏观影响混为一谈。

关键词：敦煌佛教文献；汉藏佛教；禅宗；古藏文；文化互动

DOI：https://doi.org/10.62177/apss.v2i5.1873

引言

敦煌藏经洞文献改变了学界认识中古时期汉藏佛教关系的方式。传统佛教史大多依靠后世编纂的教法史、王统史或者宗派史来追溯吐蕃佛教的产生，这些材料可以保存宏观叙事，但是已经经过了后世宗派立场和历史记忆的重构。与之相比，敦煌汉、藏文写卷更接近宗教活动发生的现场，同一个经典可以有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抄本，写卷中保留有译语、删改、题记、发愿和抄写痕迹，一些未进入后世正典的禅宗文献和疑伪经也得以保存。才让认为敦煌藏文佛教文献是现存最早的一批藏文佛教写本，它所具有的价值不仅属于佛教史，也牵涉到民族关系、语言文字和早期文献形态。[1]

一、敦煌佛教文献中的多语文本场与互译基础

（一）汉藏文写卷共存与跨语际文本生态

敦煌材料最突出的优势就是汉文、藏文以及其它文字的佛教文献在同一个地区长期共存。思想交流

作者简介：张晓琳（1993.03）汉，天津人，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创意与中文研究。

基金项目：无。

史中共存使研究者可以比较同一经典在不同语言中结构、术语、解释的差别。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是单个的。陈立华认为敦煌古藏文《心经》略本在吐蕃时期与广本并存，具有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因素的重叠。[2] 这说明经典传播并没有在短期内形成一个标准文本，而是在不同的文本链上存在着多条。如果只以译得是否准确来评价这类写卷，就会忽略其思想史价值。异译、略译、语序调整、局部增删等都会体现出译者对于陌生概念的理解方式。一个术语一旦在新的语言中稳定下来，就会对后续经论的理解方式产生影响，因此翻译本身就是教义建构。敦煌写卷保留了标准化之前中间的状态，使我们能够观察佛教概念是怎样经过多次试译、选择、校正而进入藏语知识体系的。

（二）古藏文《心经》所见概念转译与版本并行

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版本现象就说明跨语际传播不是一次完成的。吐蕃时期略本和广本并存，既体现了不同的翻译系统，也说明经典在诵持、讲授和抄写中的用途不同。版本差异如果被简单地当作“正误”，就会忽略其背后不同的社群使用选择；反之，将术语、篇章、书写形态结合起来考察，就会看到般若类思想进入藏语环境后逐步标准化的过程。

（三）汉地疑伪经藏译与地方佛教资源的流动

敦煌藏文写卷 P.T.972 给出的例证更能说明跨语际转写。吉西次力通过与传世《圣树木经》及相关写卷对勘，认为 P.T.972 是译自汉文的疑伪经，其中一些概念必须放到汉文语境中才能准确理解。[3] 这一判断的意义在于证明进入藏语世界的并不只是印度来源或者官方认可的经典，汉地地方佛教文本也可以被翻译、抄写、重新解释。疑伪经长期被传统目录学置于正典边缘，但是对文化互动研究来说却有特殊的价值。此类文本更贴近地方社会的现实需求，可以吸收民间伦理、功德观念、祈愿方式、日常禁忌，传播路径也较大部头经论灵活。P.T.972 的存在把汉藏佛教思想交流的观察范围从精英哲学扩大到地方宗教生活，说明跨文化传播不是只有经典、译师、僧团这条途径，还有普通信众真正能使用、理解的宗教文本。

二、禅宗文献所见思想传播与再解释

（一）摩诃衍禅宗材料与“顿渐之诤”叙事再审

汉藏佛教思想交流中受到关注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摩诃衍和禅宗在吐蕃的活动。后世藏文史籍常以“顿渐之诤”来解释汉地禅宗的退出，从而形成清晰的胜负叙事。但是敦煌藏文禅宗文献显示，历史过程比这个叙述要复杂得多。张亚莎根据敦煌材料认为，吐蕃后期还存在禅宗活动，有与摩诃衍、虚空藏等有关的传承线索。[4] 这就意味着一次辩论即使是真的，也不能自动清除已经进入地方社会的文本、修持方式和师徒网络。因此，“顿渐之诤”更适合作为观察某一阶段宗教政策和教义竞争的窗口，而不能被当作汉地禅宗在吐蕃历史上的终止点。官方选择可以改变寺院的资源配置和政治合法性，但是不能同步终止已经存在的文本复制、私人传授和地方修持。敦煌材料保存了这些宏大叙事之外的残余和延续，使禅宗在吐蕃的历史中重新呈现出时间差和地域差。

（二）顿悟、无念与观心的跨语际表达

摩诃衍禅宗文献的另一价值就是记录汉地禅宗概念进入藏语之后的表达方式。顿悟、无念、观心等观念具有很强的语境性，如果要在藏语中传授，就必须重新选择术语并建立解释链条。多布旦、仁欠卓玛对相关研究的综述显示，敦煌藏文摩诃衍禅宗文献已经成为重新认识“僧诤”、禅宗在吐蕃边地持续传播的重要依据。[5] 因此，这些藏文写卷不能被看作是汉文禅籍的简单附属品，而应该看作是新的解释共同体留下的思想成果。禅宗概念进入藏语之后，还会受到目标语言语义结构和已有佛教术语的双重制约。同一个汉语概念可以有不同藏译，而相近的藏语词汇也不一定完全对应汉文原义。因此敦煌藏文禅宗文

献的价值不单是证明“禅宗曾经存在”，更在于保留了思想被重新解释的具体痕迹。对这些术语进行语境化分析，才能区分译者主动选择、抄写讹误和后世概念回读之间的差别。

（三）文本延续与宗派边界之外的思想流动

宗教思想的传播具有很强的惯性，经典可以被保存，弟子可以继续传教，有些禅修观念还会脱离原来的宗派名称而进入其他修行体系。因此，对禅宗在吐蕃的影响应该从具体的文本、人物、地域网络入手，而不能用单一事件来概括数十年的思想流动。敦煌禅宗写卷所体现出来的，就是官方叙事的式微和地方实践的延续之间的张力。

三、文本生产与地方社会：汉藏佛教文化互动的社会机制

（一）翻译、选择与再语境化

从敦煌写卷可以看出，翻译一直伴随着解释。译者必须在保留异质性与让受众理解之间做出选择，完全音译可以保存来源特征，但是难以进入日常理解，完全意译又会引入目标语言既有语义。汉藏佛教交流中许多概念，都是在长期使用、比较、修订中逐渐稳定的。写卷时代各种译法的出现，体现出了概念标准化之前译者之间的竞争状态，也表明了翻译者不是透明的媒介，而是思想重构的参与者。因此，汉藏佛教思想交流的关键不是为每一个概念找到唯一的“源头”，而在于重建它怎样在不同的文本和社群之间移动。敦煌材料尤其适合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保存了后来被规范本抹平的差异。差异不是文献的缺陷，而是历史过程本身。古藏文《心经》异本、P.T.972 汉文来源、禅宗文献多样表达，分别说明经典、地方信仰、修持思想都经过选择性吸收和再语境化。

（二）写经制度、发愿实践与社会嵌入

思想交流如果只停留在译者和高僧之间，那么它的历史影响就很小。敦煌材料表明，吐蕃统治时期佛经抄写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组织制度，有写经生的选拔、经费来源、纸墨供应、校勘、执事人员设置。[6] 该制度把佛教文本从少数人的知识变成可以复制、可以养分、可以流通的公共宗教资源。大量写经需要僧侣、官府、写经生和施主之间不断协调，使文本生产直接嵌入到地方财政和社会关系之中。题记、愿文、功德记载都体现出佛教交流有很强的情感、伦理色彩。抄写一部经典既可以为赞普、官府或者寺院服务，也可以寄托个人为亲属祈福、追荐亡者或者求愿的现实需求。当不同的语言群体都存在着“写经积德”“供养祈愿”等实践逻辑的时候，佛教就成为跨族群交流的伦理媒介。日常层面的文化互动比教派论争更稳定，因为政治关系可以变化，官方支持也可能中断，但是已经进入家庭和社区生活的信仰实践不会立即消失。

四、敦煌佛教文献的史料价值与解释边界

（一）从二元源流到多源互动的解释转向

敦煌佛教文献使汉藏佛教关系研究从“印度—吐蕃”和“汉地—吐蕃”二元框架中走出来。印度佛教对吐蕃经典和哲学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并不排除汉地佛教在禅宗、地方经卷、信仰实践、文本分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敦煌材料把不同的来源放在同一个历史现场里，迫使研究者从“究竟谁影响了谁”转向“不同的资源怎样被重新组合”。该视角可以解释早期藏传佛教既有深厚的印度佛教基础，又有明显的汉地佛教痕迹。

其次，敦煌文献把研究从“僧诤胜负”转向了长期传播网络。宗教思想的实际流动包含教师与弟子、译者与抄经生、寺院与官府、施主与普通信众。只有把这些关系纳入视野，才能说明文本为什么被保存、思想为什么发生变形、某些传统为什么在官方叙事中式微之后还能延续。古藏文《心经》版本比较、

P.T.972 来源辨析、禅宗写卷传承研究、写经制度整理，从文本、思想、制度三个层面证明了“文本—制度—社会”三层互证的必要性。

（二）写卷材料的文献学约束与互证方法

但是把敦煌写卷看作接近历史现场的材料，并不意味着任何一件写卷都可以直接代表整个吐蕃佛教。写卷具有偶然保存性，某一文本大量留存，不一定和组织性抄写有关，某一教派材料较少，也不一定说明其社会影响微弱。因此，个案必须和经录、题记、制度文书、后世传承材料互相印证。敦煌文献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可以检验宏大叙事的细节证据，而不是用新的单一材料来取代旧的单一叙事。

同一经典不同写本之间的差异，不能一概地解释为思想分歧。有的是抄手漏抄、异体字、口授记录造成的，有的是译者概念选择造成的。判断二者，需要结合纸张形制、字体、题记、词汇系统和同类写卷进行比较。因此敦煌佛教思想史研究就天然地要求文献学和宗教史相结合，先辨认文本是如何形成的，再讨论它表达出什么样的思想。规范本与写卷异本之间的张力本身就是知识标准化的历史痕迹，可以显示某些译法为何被保留、某些表达为何被淘汰，以及官方译经规范与地方宗教使用之间并不完全同步的关系。

（三）接受者能动性与结论尺度的控制

敦煌材料把“接受者的能动性”当作汉藏佛教交流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无论《心经》异本、疑伪经藏译还是禅宗写卷，都说明接受者不会完整照搬源文本，而是在理解能力、修持需要和地方知识结构的制约下做出选择。有些内容被删去，有些概念被重新解释，有些实践因为适合地方社会而得到加强。正是有选择的转化，外来思想才真正进入新的文化环境。因此，所谓“影响”不能只用源头和结果相似程度来衡量，还要考察接受者怎样通过翻译和使用参与新意义的生成。

同时代表作层面的文献分析要保证证据强度和结论范围相匹配。敦煌写卷可以证明某一文本、某一术语或者某一修持传统在某个时空中存在，但是不能自动推出它在整个吐蕃社会中的普遍程度。研究中要区分出可证实的存在、可推测的传播范围和宏观历史影响这三个层次，用经录、制度文书、题记和后世传承材料逐级互证。证据分层可以提高论证的可靠性，也可以使敦煌材料真正起到修正已有叙事的作用，而不是被新的宏大判断所覆盖。

结语

敦煌佛教文献的价值，不单是补充一些失传的经典或者异本文本，更是保存了汉藏佛教思想交流还没有被后世规范化之前生成的过程。《心经》异本显示经典在翻译和使用过程中逐渐形成稳定的表达，P.T.972 说明汉地地方佛教资源可以越过正典边界进入藏语世界，摩诃衍禅宗写卷也说明官方叙事和地方传播之间并不完全同步；写经制度、题记、发愿材料进一步证明，思想只有进入组织结构和日常实践，才可能形成持久的文化影响。因此，敦煌应当被看作是能够产生新意义的文化接触区，而不是中原和吐蕃之间的被动通道。与此同时，写卷的偶然保存性也要求研究者控制结论尺度，用文本对勘、物质形态、制度文书、后世传承等多重互证。用这种方法重新审视汉藏佛教关系，可以更准确地呈现早期藏传佛教多源互动、选择吸收和再语境化的历史特征，也使敦煌文献真正成为解释中古汉藏文化互动机制的一手材料。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才让 . 敦煌藏文佛教文献价值探析 [J]. 中国藏学 ,2009(2):35–44.

[2] 陈立华 . 关于敦煌本古藏文《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解读 [J]. 西藏研究 ,2012(3):62–68.

[3] 吉西次力 . 敦煌藏文写卷 P.T.972 文本考释及内容对勘 [J]. 西藏研究 ,2023(5):77–87+161–162.

[4] 张亚莎 . 吐蕃时期的禅宗传承 [J].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19–27+106.

[5] 多布旦 , 仁欠卓玛 . 敦煌藏文摩诃衍禅宗文献研究综述及命题思考 [J]. 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25,40(2):138–144.

[6] 赵青山 .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写经制度 [J]. 西藏研究 ,2009(3):45–52.